

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李友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发展成就卓著,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学科影响力逐渐扩大。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一重要指示激励着中国社会学界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刻苦钻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者勇担新的历史使命,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

始终与时代同行

社会学从来都是与时代同行、直面社会现实、探究社会演变之理的学问。

19世纪末,面对民族危亡与国力衰弱,以严复为代表的早期学者将西方社会学思想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经世致用的“群学”,探究国家治乱兴衰之因,以求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秉承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本土经验调查为特色,推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起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吴文藻、费孝通、梁漱溟等老一代社会学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结合,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推动社会改革。在战火纷飞中,他们虽历经磨难,但学术追求与人文关怀始终不改,树立起中国社会的独特风格,其研究成果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的一个窗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次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凸显国家建设与发展对社会学的呼唤,使中国社会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推动了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进程中的诸多特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开展诸多扎实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研究”、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现状、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发规律。

40年间,中国社会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成为改革开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和谐社会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每一项涉及国计民生、关系人民福祉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学学者都积极参与、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强调人文关怀,兼顾资政启民,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突出的学术价值、时代担当和主体性格。

研究成果丰硕

40年来,中国社会学不仅开辟出诸多富有洞见的研究议题,还通过国际学术对话提高本土理论的开放性;不仅通过反思和创新谋求发展,还通过“重新补课”进一步挖掘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与脉络;不仅从中国生活实际中发现真问题、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提出新范式,还以这样的“文化自觉”延伸自身话语的“解释链”。

在社会转型理论方面提出许多重要观点。比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的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对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改革逐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带动社会系统性特征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某些方面指标的变化,而是总体的、全面的转型;等等。围绕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展开对话,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建性和启发性的观点。比如,转型过程不仅包含社会现代化,也包含社会发展;转型的同时伴随着制度延续与创新;等等。

在中层理论建构方面取得诸多原创性成果。比如,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发现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形态,与西方社会的“弱关系”不同,中国社会的“强关系”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城镇化研究中,指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乡村工业化,特别是温州、晋江、苏南等地的经验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补充和丰富了“自上而下”(由中心城市带动乡村城镇化)推进城镇化的理论;在劳工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劳动体制、“老工人”与“新工人”等研究议题与概念;在社会治理研究中,深耕基层治理、关注组织制度变革,并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之外提出了“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

伴随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大量具有鲜活本土意识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涵盖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建设等众多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创新和数据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L)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持续开展,为了解社会动态、进行学术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库支撑。

面向新时代,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

40年来,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既感悟到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也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些变化交汇在一起,一方面可以验证社会学经典理论假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多面向、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机遇。

中国社会学学者愈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结构转型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的翻版,也不是对自身传统的全盘否定;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最佳的转型模式,也不存在现成的转型模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叠加,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并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这一过程呈现出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文化复杂交错的新特征,社会组织方式、分工模式、运行机制、治理体制都在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矛盾、问题与挑战,但中国都能成功应对,始终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改善。这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独一无二的特点,西方理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更难给出答案。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学学者形成了共识:应该建立也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从理论层面解答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能够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生共荣;另一方面,要从实践层面阐明处于世界复杂格局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组织模式甚至文化观念的重要变量。特别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对人类社会分工逻辑提出严峻挑战。社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加强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分析、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社会学学者要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努力提高研究水平,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中国社会学学者应胸怀大志、放眼世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魄力,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不做消极的批判者,而要通过积极的理论创建者和民族复兴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提出更多原创性概念。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质的研究范畴,但在深入研究当代实践时仍不免感到缺少合适有效的概念工具。同时,在研究中还存在碎片化、整合不够,难以对西方偏见或错误观点作出有力回应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形成适用于本土实践的理论研究机制,催生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

提高学科建设水平。40年来,虽然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学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独立性,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关性不强,学术问题之间的隔离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还面临着优质学术期刊数量不多、对年轻社会学学者的激励不足、学术成果考评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这就要求创新科研体制,加强学科建设,完善专业方向,提升整体学术水平,推动中国社会学实现新发展、新突破。

倡导多学科交流合作。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社会学提出了众多新的研究课题。应该看到,在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单一学科已经越来越难以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分析、解释和预测,加强多学科交流合作势在必行。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和特权,多学科融合发展正在成为新思想萌发的重要推动力。这就需要打破哲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突破狭隘的思维定势,在多学科交流合作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创新发展,以更好地分析和指导实践。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努力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

杨 典

现实基础。社会学是现代的产物,是认识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升民众福祉的科学门类。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西方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立足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因此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相对性和情境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知识,而非客观的、普适的、揭示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它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现代化,成为众多国家的效仿对象。西方社会学借助人们对现代化的渴望和西方政治经济霸权进入发展中国家,被一些国家和民众误认为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普适的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维持总体和平局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比如,德国经济在上世纪50—70年代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80年代生机勃勃,韩国、新加坡经济在上世纪60—80年代实现腾

飞。它们的发展过程都以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为基础,并没有采取与英国、美国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却都实现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过程并非只有单一模式,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也不尽相同。同样,作为现代化产物的社会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非凡,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前行。由于独特的基本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特点。比如,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注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在文化传统方面,与资本主义文化过度追求效率和自利,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情况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以人为本、和谐包容、互利并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在国家治理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片面强调

“小政府大社会”导致社会乱象丛生不同,中国根据总体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起涵盖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各领域的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蓬勃发展,呼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国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概念、理论以及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践根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社会学学者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发展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徐水祥

大家手笔

1978年,我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40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作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重要指示。从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深入推进,社会学的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在学科设置方面,中国社会学现已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多个学科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仅有三四所高校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发展到约有100所高校设置本科专业、70多所高校设置硕士研究生专业、20多所高校设置博士研究生专业;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仅有4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发展到有300多所高校开设这一专业、100多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已经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社会学关注的课题几乎覆盖宏观社会、中观社会、微观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城乡差别与融合、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贫富差距、反贫困与脱贫攻坚、婚姻与家庭、儿童与妇女、老龄化问题等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成就、研究内容和成果之丰富,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社会学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象、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实践功能。40年来,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建设人才和治理人才,他们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中国社会变化提供了大量学术文献和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学能在短短40年里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学科自省、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那时流行的研究倾向是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释我国现实社会问题。这种不加区别的“拿来主义”,难以真实反映问题本质,更难以作出科学解释,往往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学界开始进行学科自省。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其中蕴含的总结新思想、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等主张,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学者开始进行学科自省。本世纪初,郑杭生进一步提出“理论自觉”,倡导并鼓励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正是在“文化自觉”特别是“理论自觉”命题的启示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觉性和学科主体性越来越强,突出表现为不再满足于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而是注重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进行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提升和理论建构。例如,上世纪90年代对“单位制”“农民工”“社区建设”“文明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本世纪以来对“社会建设”“社会体制及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体系”等概念、理论的阐释与建构,等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原创性贡献。

除了在学术层面主动进行理论建构和话语建构,中国社会学还积极在实践层面推动社会建构,以理论创新推动社会领域制度、体制、政策、组织和社会服务体系等的创新与发展。在这方面,具有行动科学特征的社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模式,即作为集理论研究者、政策倡导者于一体的角色深入实践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成为推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社会组织发展和基层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重要力量。

可见,在学科自省的基础上开展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通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我们得以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实践能力、可与国际对话的社会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开展理论建构与实践建构,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以更好服务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更好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实践。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完善城市住房制度的有益参考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变迁、绩效与创新》简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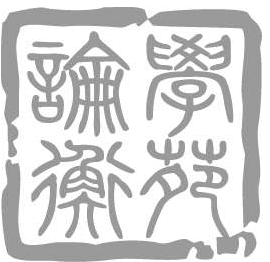
洪银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为构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高波撰著的《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变迁、绩效与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新成果。

该书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加快完善城市住房制度体系。一是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完善以商品房为主、租购并举的多

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建立与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住房市场和土地制度。二是健全住房财税制度和住房金融制度。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保障,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住房保障体系。四是健全住房市场和行业法制。该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具有一定理论水准和参考价值。

新书推介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社会发生大变革。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独特发展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历史根基。

为了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经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价值和贡献,有必要简要回顾、分析西方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和